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6.017

当亲近遇到疏离：数字环境下"Z世代"的代际沟通回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高芳芳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基于问卷调查（N＝703）考察"Z世代"针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并重点探究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会显著降低"Z世代"的代际沟通回避，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会显著提升其代际沟通回避；在认知层面，"Z世代"越是感知到沟通有效性低或沟通边界感弱，就越有可能产生代际沟通回避；在情绪层面，代际沟通焦虑会引发沟通回避行为，而代际沟通焦虑本身亦受到家庭和认知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要改善"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需要父母和青年的共同努力，以建构平等对话的家庭沟通环境、减轻年轻一代的代际沟通焦虑、鼓励适度有效的在线代际沟通。

［关键词］数字环境；"Z世代"；代际沟通回避；家庭沟通模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6-0143-10

When Intimacy Meets Alienation: Explor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of "Generation Z"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GAO Fangfang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N=703),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onlin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of "Generation Z",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family level, the conversation-oriented family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among "Generation Z", while the compromise-oriented family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e more "Generation Z" perceived low effectiveness in communication or weak boundary awarenes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result in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At the emotional level,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induced avoidance, which itself was influenced by family and cognitive factor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onlin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of "Generation Z", it requires joint efforts from both parents and "Generation Z" to construct an equal and conversational family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o reduce communication anxiety, and to encourage effective and moderate onlin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nvironment; "Generation Z";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voidance;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theory

* ［收稿日期］2024－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健康传播研究（24FXWB010）
［作者简介］高芳芳（1983—），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智能传播、数字媒体。

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注重“以孩子为中心”。在代际沟通中,父母往往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诲,子女也被要求做到孝顺和礼敬。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多元价值文化的兴起,近年来“断亲”“原生家庭”“扫兴父母”等词汇屡屡登上社交媒体话题榜,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代青年对家庭关系、父母权威等的认知变化。技术上,数字环境重构了代际交往的空间和互动模式,重塑了青年人的自我和家庭身份认同,并深刻地影响着家庭中的亲子沟通与情感维系[1]。随着社会的频繁流动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家庭成员之间越来越习惯于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家庭沟通、维系家庭关系[2]。可以说,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青年人与家人分享信息、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然而,社交媒体在为青年带来代际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为他们增添了新的烦恼。不少青年人苦于收到父母分享的各类“鸡汤文”、健康谣言、催婚催生催奋斗等容易引发代际矛盾的信息而难于应对。面对父母主导的在线代际沟通,青年人常常处于话题观察者或游离者的弱势地位[3]。为了逃避碎碎念、“为你好”式的捆绑及“不知道说什么”的尴尬,不少青年人采取语言或技术上的回避,如“行行行”“知道了”“再说吧”;或采用不看不回等方式来屏蔽父母的唠叨,隔离双方的异见。当此类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被越来越多青年采纳时,他们与父母都难免在沟通中感觉进退失据,导致亲子关系愈发疏离、紧张甚至冲突。究竟是何原因导致青年人的此种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在数字时代,如何让代际沟通更畅通?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从家庭、认知和情绪三方面入手,在家庭这一特定的传播场景下,考察我国的“Z世代”青年针对父母的在线沟通回避行为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优化数字时代的代际沟通和家庭关系提供见解与建议。

之所以选择“Z世代”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首先,从社会化的角度看,“Z世代”,即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青年人,目前正处于求学或初入职场的阶段。独立生活和继续依赖父母这两种状态在他们身上兼而有之,因此与父母维持沟通与联系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且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家庭关系与人际沟通。其次,从数字技术的角度看,“Z世代”作为我国的第一代网络原住民,数字技术深刻地嵌入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塑着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心态、行为,也帮助他们从结构性力量中部分解放出来[4]。在数字化的家庭代际互动中,“Z世代”往往表现得游刃有余,而他们的父母则亦步亦趋[5]。作为数字时代的反哺者,他们的数字化代际沟通实践及反映在其中的家庭和代际观念也影响着父辈的行为和思想,推动着社会的变迁与更新。因此,对数字环境下“Z世代”的代际沟通回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社会转型与技术发展给社会、青年及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一 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数字环境下的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代际沟通是分属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信息传播及意义传递[6],大部分语境下与家庭内部的交流有关(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祖父母与孙辈之间)[7]。家庭中的代际沟通是家庭结构得以建立和保持的关键,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及家庭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代际沟通研究的深入,代际沟通回避,特别是青年群体在与父母沟通过程中的回避行为(adolescent-parent communication avoidance)成为新的关注热点[8]。在积极意义上,青年群体能够通过代际沟通回避,如避免谈论特定的敏感话题来保护其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发展自主性[9]。在消极意义上,青年群体的代际沟通回避可能会对其家庭关系及个体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10]。因此,研究代际沟通回避问题非常必要。

数字技术及其所形成的媒介系统(media ensemble)为代际沟通提供了新的媒介,深度型构了代际之间的交流空间与互动关系[11]。研究发现,当父母通过转发网络消息来实现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时,部分青年子女会通过不点开链接、不回复信息等回避行为来实现“沉默的对抗”[12]。数字技术为此种回避提供了便利,使之日渐常态化[13]。现有研究主要从代际沟通和信息回避两个角度探讨数字环境下青年群体的代际沟通回避行为,从代际沟通角度出发的研究仅就回避方式(如忽略、拒绝、避免或延迟等)及回避程度等进行了划分;从信息回避角度出发的研究往往只关注青年群体回避父母发来的在线信息,而忽视了在双向的代际沟通中青年人可能存在的避免主动发起沟通的行为[14]。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将数字环境下“Z世代”对父母的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界定为他们对父母发来在线信息的有意忽略、逃避、不回应及避免主动与父母进行在线沟通的行为。

在影响因素上,从代际沟通的视角出发,既有研究发现沟通能力、沟通质量[15]、认知信念和情感反应[16]以及亲子关系和关系满意度[17]等皆会显著影响家庭中的沟通情况;从信息回避的视角出发,研究

发现情境因素（如社会规范、任务驱动）、信息因素（如信息质量、信息成本、信息隐私）、个人因素（如认知冲突、感知控制、应对资源、负面情绪）等能显著影响人们的信息回避行为[18]。本文试图延续前人的研究脉络，立足家庭与媒介化这一具体的研究情境，从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着手，探究其对“Z 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的影响。

（二）家庭因素：家庭沟通模式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家庭沟通模式对青年人的心理健康、情感态度与行为方式的影响不容忽视[19]。根据家庭沟通模式理论（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eory），家庭沟通模式可以分为妥协取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和对话取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两个维度[20]。在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家庭成员相信开放和频繁的沟通对于和谐愉快的家庭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鼓励所有人都参与到广泛自由的家庭讨论与互动中[21]。高对话取向的家庭往往将与子女的沟通视作是教育和交往的重要手段。而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要求家庭成员在观点态度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家庭冲突。高妥协取向的家庭在代际关系上强调子女对父母权威的顺从，力图保持长幼有序、等级严格的家庭结构[20]。对话取向和妥协取向往往呈负相关关系，但两者并不互斥。事实上，这两种模式或多或少地在大多数家庭中同时存在，两者对家庭的影响往往相互依赖[22]。虽然家庭沟通模式理论源于西方，但在我国语境下依然适用[23]。

研究发现，来自高对话取向家庭的青年人往往具备更强的沟通能力，能够在家庭中畅所欲言，如放松地与父母讨论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等[24]。相对地，来自高妥协取向家庭的青年人往往代际沟通频率较低，且更倾向于在代际互动中避免冲突、保持和谐[19]。由此推断，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可能导致“Z 世代”在数字环境下的代际沟通中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通过回避代际沟通来避免与父母之间的潜在冲突；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让“Z 世代”更愿意与父母沟通，即使面临分歧和冲突也能开诚布公地对话。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增强“Z 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H1b：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减弱“Z 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三）认知因素：沟通有效性与边界感的影响

在人际传播中，沟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效果等被认为是影响人们沟通意图和行为的重要因素[25]。具体到代际沟通中，青年人对父母沟通能力及代际沟通有效性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其与父母的对话情况[26]。一般来说，青年人认为与父母的沟通越有效或越有帮助，就越有可能听从父母的建议，并保持与父母的沟通。有意思的是，青年人与父母对代际沟通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27]。往往是青年人对代际沟通的评价而非父母的看法，更能预测青年人后续的态度和行为[15]。换句话说，无论父母觉得自己在代际沟通上做得有多好，如果青年人觉得与父母沟通无效或无用，依然有可能出现代际沟通回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Z 世代”认为代际沟通越有效，其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越少。

除了沟通有效性，沟通过界也可能影响代际沟通行为。综合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28]、边界感（boundary awareness）和家庭沟通相关研究，在家庭中，个人所定义的“沟通边界”决定了谁在“内部”（可以共有和分享特定信息）、谁在“外部”（不被允许访问特定信息）[29]。但这些边界的控制规则通常是模糊的，由于家庭成员对沟通边界的认知和实践各不相同，问题随之产生。当今的中国家庭，一方面受传统文化影响，重视家庭和谐，强调家人和乐亲密，忽视代际关系中的边界感，导致父母往往过度关注或关心子女，甚至出现过度干涉或沟通过界的情况；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意义上家庭中的隐私和沟通边界[30]，“Z 世代”作为子女虽然接受父母的在线“在场”，但当他们觉得来自父母的信息太多[12]、边界感太弱导致自己不胜其扰、快被淹没时[16]，就可能出现沟通回避行为以更好地调整和协商代际沟通的边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Z 世代”认为父母的沟通过界越严重，就越有可能出现在线代际沟通回避。

（四）情绪因素：代际沟通焦虑的中介与影响

本文所关注的代际沟通焦虑是指“Z 世代”在面对与父母的代际沟通时，心理上紧张不安的负面情绪状态。作为一种状态焦虑，代际沟通焦虑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会随着个体所处情境的变化而波动变化[31]。在家庭因素上，研究发现，强调服从父母的妥协取向家庭沟通模式可能引发青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回避[32]，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常被视为青年心理健康的积极预测因子[19]。在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父母往往鼓励青年人进行自我表达并积极回应，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年

人的代际沟通焦虑。本文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增强“Z 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

H3b：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减弱“Z 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

此外，研究还发现，子女越是认为与父母的沟通有效性低，就越有可能产生焦虑情绪[15]。在家庭中，当家庭成员觉得沟通中的边界感被打破时，可能出现焦虑情绪[33]。本文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Z 世代”认为代际沟通越有效，其代际沟通焦虑越弱。

H4b：“Z 世代”认为代际沟通过界越严重，其代际沟通焦虑越强。

焦虑等负面情绪被认为是引发回避行为的重要因素[34]。人们会因为焦虑而产生延迟获取甚至回避信息和沟通的行为[35]，从而通过回避来缓解或减轻焦虑[36]。在代际沟通中，焦虑与代际沟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已被证实[15]。本文据此推断：

H5：“Z 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越强，就越有可能对父母采取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在前述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验证代际沟通焦虑在家庭因素（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认知因素（沟通有效性、沟通过界）与“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a：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通过提高代际沟通焦虑，进而增多“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H6b：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进而减少“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H7a：代际沟通有效性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进而减少“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H7b：“Z 世代”所感知到的父母沟通过界通过提高代际沟通焦虑，进而增多其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基于以上所有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图 1 所示的研究模型。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基于“问卷星”调查网站通过北京、浙江、长沙、广州、成都等地 6 所高校的校内论坛及豆瓣、小红书等在线平台发放。调查对象为“Z 世代”，即出生于 1995 年至 2009 年之间，且与父母有过在线沟通回避经历的青年人。调查对象需要通过微信进行登陆和实名登记，并限制同一 IP 只有一次作答机会。每个成功作答且答案有效的填答者可以得到 3 元报酬。问卷于 2023 年底发布，历时 2 个月，共回收问卷 1004 份，剔除无效问卷（如年龄不符、错答、漏答、极端作答、未通过注意力测试、作答时间过短等）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703 份。样本涉及我国 28 个省级行政区的“Z 世代”青年。有效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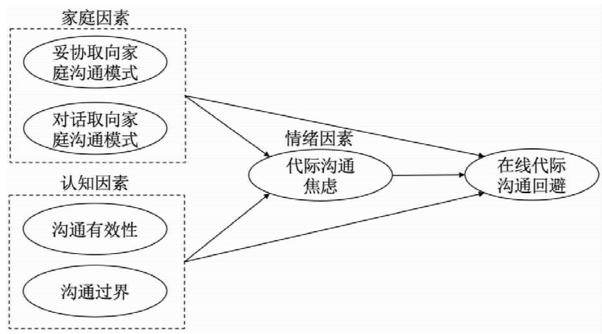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703$）

变量	样本特征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333	47.4
	女	370	52.6
年龄	15—20 岁	140	19.9
	21—23 岁	272	38.7
	24—26 岁	218	31.1
	27—29 岁	73	10.3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0	0.0
	高中、中专或技校	7	1.0
	大专、大学本科	321	45.7
	研究生及以上	375	53.3
父母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57	22.3
	高中、中专或技校	203	28.9
	大专、大学本科	301	42.8
	研究生及以上	42	6.0

（二）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主要围绕 6 个潜变量展开，包括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代际沟通有效性、代际沟通过界、代际沟通焦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由于潜变量难以直接观测，研究建立了多维度的观测变量并设计了相关题项对潜变量的指标进行评估。观测变量的测量题项均采用或改编自既有量表和相关研究，并与本文的研究情境相结合，同时设置部分反向题以确保研究的信效度。除性别等基础信息外，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测量。

对在线代际沟通回避的测量参考了前人的相关研究，使用了 4 个题项：(1)我通常会回避父母给我发的在线信息(如不点开信息、信息屏蔽、设置免打扰、延迟获取等)；(2)我通常不会回复父母的在线信息(如已读不回、不看不回、延迟回复等)；(3)我通常会回避与父母进行在线对话；(4)我通常不会主动与父母进行在线沟通。以上 4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Cronbach's $\alpha=0.87$，$M=2.49$，$SD=0.98$)。

妥协取向和对话取向是家庭沟通模式的两个维度，对其测量改编自家庭沟通模式量表[22]。其中，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包含 11 个题项：(1)当涉及比较重要的事情时，我父母希望我无条件服从；(2)我家通常是我父母说了算；(3)我父母觉得在家庭里维护家长的权力和威严很重要；(4)当我不顺从父母的观点时，他们会很生气；(5)当父母认为我存在不当行为时，他们会严厉批评我，并不会去了解我做这件事的想法；(6)在家时，我被要求遵守父母的规则；(7)我父母经常说类似于“长大以后你就明白了”的话；(8)在和父母交流时，他们经常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希望我有怀疑；(9)父母认为我不应该和他们顶嘴；(10)父母认为无论何事都不需要和我讨论；(11)父母认为我应该听他们的话。以上 11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Cronbach's $\alpha=0.93$，$M=2.90$，$SD=0.84$)。

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包含 15 个题项：(1)父母允许我在一些事情上存在和他们不一致的意见；(2)父母经常说类似于“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决策中都应该有发言权”的话；(3)家里在商量事情时，父母经常会询问我的意见；(4)父母鼓励我挑战他们的想法和信念；(5)父母经常鼓励我看事情的两面(积极面和消极面)；(6)我经常告诉父母我关于事情的想法；(7)我几乎可以和父母说任何事；(8)我和父母经常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情绪；(9)我和父母聊天会感到很放松；(10)我很喜欢和父母聊天，即使我们意见不一致；(11)父母鼓励我表达自己的感受；(12)我会毫无保留地和父母交流自己的感受；(13)我和父母经常会谈论一天中我们所做的事情；(14)我和父母经常谈论对将来有帮助的计划；(15)父母喜欢听我的观点，即使我的观点与他们相左。以上 15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Cronbach's $\alpha=0.95$，$M=3.15$，$SD=0.82$)。

对沟通过界的测量参考了前人有关家庭中代际沟通界限[30]的研究，具体使用了 4 个题项：(1)父母频繁给我发送在线信息，让我觉得是个负担；(2)父母给我发了太多在线信息，让我常常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3)父母在与我的在线代际沟通中缺乏边界感；(4)父母与我的在线代际沟通对我的干扰多于帮助。以上 4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Cronbach's $\alpha=0.81$，$M=3.80$，$SD=0.68$)。

对沟通有效性的测量改编自沟通有效性量表(Conversational Effectiveness Scale)[25]，包含 5 个题项：(1)在我看来，与父母的在线沟通是有用的；(2)在我看来，与父母的在线沟通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反向)；(3)我很难通过与父母的在线沟通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反向)；(4)父母能够通过与我的在线沟通达到自己的目的；(5)我能够通过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获得回报。以上 5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Cronbach's $\alpha=0.86$，$M=2.65$，$SD=0.71$)。

对代际沟通焦虑的测量改编自简版状态焦虑量表(Short State Anxiety Inventory，SSAI)[37]，包括焦虑存在与焦虑缺失两方面，使用了 6 个题项：(1)我会对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感到烦乱；(2)我会对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感到紧张；(3)我会对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感到烦恼；(4)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让我感觉轻松；(5)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让我感觉平静；(6)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让我感觉满意。其中，后 3 项反向计分。这 6 个题项相加取均值后为该变量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代际沟通焦虑越高(Cronbach's $\alpha=0.82$，$M=2.83$，$SD=0.74$)。

鉴于前人的研究发现，代际沟通回避可能受到沟通主题的影响[9]，故问卷还询问了被调查者与父母进行在线代际沟通时最常涉及的主题，具体包括健康主题、学习主题、生活主题、职业主题等。代际沟通主题和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被共同纳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三)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测。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均大于 0.8。同时，各变量的 KMO 值在 0.76 到 0.96 之间，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 p 值均小于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该问卷效度较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的组合信度 CR 值均大于标准值 0.7，说明其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各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 AVE 值均大于 0.5，说明聚合效度较好。如表 2 所示，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较好。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系数均未超过 0.8 这一阈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表2所显示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也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2 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指标检验结果及各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N=703)

主要变量	1	2	3	4	5	6
1. 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	**0.74**					
2. 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	0.54**	**0.73**				
3. 代际沟通有效性	−0.16**	0.41**	**0.76**			
4. 代际沟通过界	−0.54**	0.34**	0.13**	**0.78**		
5. 代际沟通焦虑	0.46**	−0.62**	−0.41**	−0.25**	**0.82**	
6. 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	0.39**	−0.44**	−0.24**	−0.39**	0.66**	**0.81**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AVE值平方根,下三角为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 $p<0.01$。

三 研究发现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经拟合,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率,即χ^2/df值为2.701,RMSEA为0.046,CFI为0.924,GFI为0.920,TLI为0.936。各项指标数值均符合参考值要求,表明模型与数据的适配度较好,也说明本研究构建的"Z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发生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图2所示的模型路径系数说明,在家庭因素上,妥协取向家庭沟通模式对"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不存在显著影响($\beta=0.01$,$p>0.05$),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显著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13$,$p<0.01$),故H1a不成立而H1b成立;在认知因素上,沟通过界会显著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beta=0.21$,$p<0.001$),而沟通有效性则会显著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11$,$p<0.01$),故H2a和H2b成立。同时,妥协取向家庭沟通模式显著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焦虑($\beta=0.17$,$p<0.001$),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显著降低在线代际沟通焦虑($\beta=-0.31$,$p<0.001$),故H3a和H3b成立;沟通有效性会显著降低在线代际沟通焦虑($\beta=-0.13$,$p<0.01$),而沟通过界则显著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焦虑($\beta=0.21$,$p<0.001$),故H4a和H4b成立。更进一步地,代际沟通焦虑会显著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42$,$p<0.001$)。因此,H5成立。

此外,研究还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年龄会显著负向影响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06$,$p<0.01$),父母受教育程度则会显著正向影响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09$,$p<0.05$),性别($\beta=0.01$,$p>0.05$)、受教育程度($\beta=0.04$,$p>0.05$)和代际沟通主题($\beta=0.01$,$p>0.05$)对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不存在显著影响。比较图2中对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产生直接影响的各路径系数可知,情绪层面的代际沟通焦虑($\beta=0.42$,$p<0.001$)对在线代际沟通回避的影响明显高于认知层面的沟通过界($\beta=0.21$,$p<0.001$)、沟通有效性($\beta=-0.11$,$p<0.01$)及家庭层面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beta=-0.13$,$p<0.01$)。比较图2中对代际沟通焦虑产生直接影响的各路径系数可知,沟通过界($\beta=0.58$,$p<0.001$)对代际沟通焦虑的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因素。

为进一步检验H6a到H7b的研究假设,即代际沟通焦虑在作为家庭因素的妥协/对话取向家庭沟通模式和作为认知因素的沟通有效性和沟通过界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5000次,加入性别、年龄、本人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代际沟通主题作为控制变量,得到中介效果的信赖区间和显著水平以及标准化估计值与其标准误结果。分析结果表明,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可以通过增强代际沟通焦虑强化"Z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06$,95% CI=[0.022,0.111],$p<0.01$),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则可以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12$,95% CI=[−0.179,−0.075],$p<0.001$);沟通过界可以通过增强代际沟通焦虑来增强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24$,95% CI=[0.170,0.320],$p<0.001$),而沟通有效性则可以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而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09$,95% CI=[−0.162,−0.028],$p<0.05$)。因此,H6a、H6b、H7a、H7b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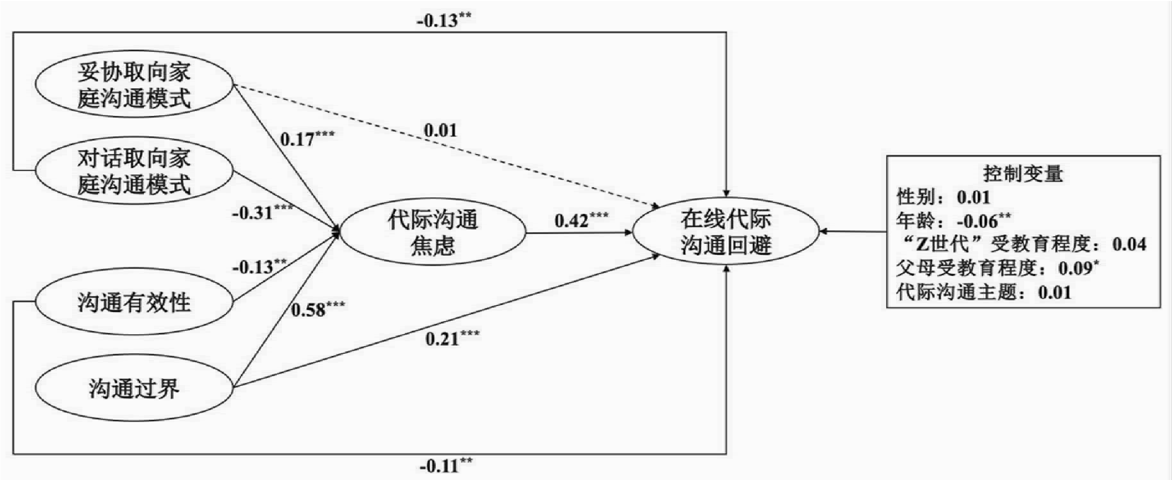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对“Z 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的影响
注：*** $p<0.001$，** $p<0.01$，* $p<0.05$。

四　结论与讨论

(一)当亲近遇到疏离:“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家庭和代际关系时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数字环境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家庭中代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我国的“Z 世代”青年是在父母精细化教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因此在家庭中受到父母和长辈更多的关注[38]。本研究发现，91.47%的被调查者($N=643$)表示父母会通过各种线上渠道与自己进行沟通和交流。由此可见，虽然“Z 世代”的父母在技术上是“数字跟进者”，但他们仍积极构建与子女之间的线上交流空间，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然而，当父母试图在数字环境下亲近“Z 世代”时，却可能遭遇疏离。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Z 世代”都曾有过在线代际沟通回避的经历($M=2.49$，SD$=0.98$)——不主动与父母进行在线沟通、不点开或刻意延迟获取/回复父母发来的在线信息、信息屏蔽、设置免打扰、已读不回、不看不回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代际关系中出现疏离、紧张及冲突。父母虽然希望与子女保持亲密联系，但“Z 世代”的自主性努力可能与父母的渴望接触存在分歧。他们试图通过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来表达自身对个人空间的追求和对自由权利的渴望，在逃离“碎碎念”“为你好”和潜在代际矛盾的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代际间的微妙平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亲子关系中的“孝而不顺”。在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子女尊重和关爱父母的情感内核并未改变，但“Z 世代”在继承、审视和批判父母思维、观念和行动的基础上，正在形成并践行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事实上，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改变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更趋亲密与平等[39]，“Z 世代”不再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他们通过沟通回避等看似消极的方式积极地调试数字环境下代际关系的边界与空间，从而既尊重了父母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但必须看到，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也会带来关注度低、亲子关系隔阂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会对代际关系、家庭关系及青年的社会化等产生冲击。因此，在数字环境下如何打破分歧和疏离、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家庭沟通模式的影响:对话取向减少沟通回避

本研究发现，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直接($\beta=-0.13$，$p<0.01$)或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减少“Z 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beta=-0.12$，95% CI$=[-0.179,-0.075]$，$p<0.001$)。其原因可能在于，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更注重家庭成员的自我导向，家庭中的沟通程度较高，作为子女的“Z 世代”在与父母的在线沟通中往往更倾向于敞开心扉。同时，在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一方面，个体的家庭满意度和家庭共同体认同程度更高[40]，从而有效抑制了“Z 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和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另一方面，在对话取向的家庭中，父母往往采用情感确认的教育方式，鼓励“Z 世代”积极应对包括代际沟通焦虑在内的负面情绪，而非消极压制或逃避问题。

研究还发现，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对“Z 世

代”的代际沟通回避行为不存在直接的显著影响($\beta=0.01, p>0.05$)。这可能是因为，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冷”“暖”两类，其中暖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父母在向子女传达自身想法时，会促进温情和亲近，而不仅仅是强调权威和规则[41]，因此并不必然引发“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但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能够通过代际沟通焦虑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beta=0.06$, 95% CI=[0.022, 0.111], $p<0.01$)。也就是说，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一旦引发“Z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则可能导致其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对这一结果的潜在解释是，在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父母往往较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导致子女需要在代际沟通中进行更多的自我反思和确认[42]，因此更有可能产生代际沟通焦虑。譬如站在未来抉择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听父母的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要遵循父母提出的作息建议和生活方式。在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下，如果父母在沟通中传递的价值观和期望与自身相悖，“Z世代”更有可能产生代际沟通焦虑，进而为了避免冲突或反抗父母而选择避免进行在线代际沟通。

(三)沟通有效性与沟通边界感不容忽视

研究发现，沟通有效性显著减少“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beta=-0.11, p<0.01$)，而沟通过界则显著增强“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21, p<0.001$)。也就是说，当“Z世代”认为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难以达成预期或边界感被打破时，往往会选择回避。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首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加大了“Z世代”和父母在价值观、人生视野、生活态度和数字参与能力等方面的差异[43]。二者的数字对话交流能力不同，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行为偏好也各异，在进行数字交流时就有可能出现沟通有效性低、沟通不畅的情况。其次，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变革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联结方式，“Z世代”外出求学和就业已稀松平常，导致疏远和陪伴缺失成为常态。与此同时，“Z世代”还经受着父辈未曾面对过的竞争压力和内卷效应。当地理和心理上的距离叠加被压缩的对话空间和共知意义内容时，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两代人可能因为不同的沟通方式、目标和需求等导致在线代际沟通的质量和效果低下，由此引发“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最后，沟通过界亦即代际之间的在线沟通由于界限感低甚至造成困扰时会引发“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这一发现也提示父母，当其试图在数字环境下对子女表达关切时需要注意适度原则，保持一定的界限感，避免因为给“Z世代”造成困扰和负担而引发他们反感和回避。

此外，沟通过界可以通过提高代际沟通焦虑来增强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24$, 95% CI=[0.170, 0.320], $p<0.001$)，而沟通有效性则可以通过降低代际沟通焦虑来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beta=-0.09$, 95% CI=[−0.162, −0.028], $p<0.05$)。换句话说，“Z世代”越是觉得与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有效性低或边界感弱，就越有可能产生代际沟通焦虑，进而采取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这呼应了既有的研究，即子女对父母沟通能力和代际沟通的看法能够预测子女的情绪，进而影响其行为[15]。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Z世代”觉得在线代际沟通有效性低或边界感弱时，就有可能出现代际沟通焦虑等情绪失衡或情感不适的状态，进而通过回避等防御性手段来进行调适。

(四)情绪在代际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代际沟通焦虑显著提升“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beta=0.42, p<0.001$)。根据路径系数可知，代际沟通焦虑对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因素。同时，代际沟通焦虑还是家庭因素、认知因素与“Z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这些发现都证实了情绪因素在“Z世代”在线代际沟通中的重要作用，也提示了降低代际沟通焦虑是减少“Z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的有效路径。

针对代际沟通焦虑，研究结果显示，妥协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beta=0.17, p<0.001$)和沟通过界($\beta=0.58, p<0.001$)会显著提升“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焦虑，而对话取向的家庭沟通模式($\beta=-0.31, p<0.001$)和沟通有效性($\beta=-0.13, p<0.01$)会显著降低“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焦虑。其中，沟通过界的影响效力明显高于其他因素。由此可见，通过在家庭中鼓励代际对话、提高代际间在线沟通的有效性，特别是保持在线代际沟通的边界感，能够显著减低“Z世代”的代际沟通焦虑，在情绪上提供抚慰和调节。

此外，研究还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Z世代”年龄($\beta=-0.06, p<0.01$)及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beta=0.09, p<0.05$)与“Z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

避行为显著相关。随着“Z 世代”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减少在线代际沟通回避。其原因可能在于，年龄的增长带来身份的转变和阅历的增加，面对日渐衰老的父母，“Z 世代”在质疑父母、理解父母、成为父母的过程中，日渐形成更深刻的对代际关系的认知，也更珍惜与父母进行在线代际沟通的机会。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Z 世代”越容易出现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也越高[44]，由此引发“Z 世代”的压力和回避。

五　研究贡献与局限

在理论层面，本文聚焦家庭这一特定场域，系统性地考察了“Z 世代”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完善了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的定义，揭示了数字环境下家庭因素、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是如何影响“Z 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的。更重要的是，本文从青年人的视角出发，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数字环境下的代际沟通研究，并基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家庭文化语境，为“Z 世代”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提供了解释。

在实践层面，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的背景下，关注代际关系有利于推动各群体的互相理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近年来，“父母皆祸害”“逃离原生家庭”等话题常常引发社会热议。如果青年人对父母的在线代际沟通回避成为常态，那势必会影响到代际间的良性互动与家庭中的情感维系。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鼓励对话突出平等的家庭沟通环境、有效且适度的在线代际沟通以及代际沟通焦虑的降低都能够有效减少数字环境下“Z 世代”对父母的代际沟通回避行为。为了让数字时代的代际沟通更加通畅，一方面，父母需要在家庭中搭建与子女对话的桥梁，更平等地与子女相处，同时在日常在线沟通中保持有效性和边界感，从而减轻青年人的代际沟通焦虑和回避；另一方面，青年人可以通过数字反哺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共同的话语体系，更好地指导父母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代际沟通，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潜在的代际矛盾和冲突，减轻焦虑情绪，促进良性沟通，构建更亲密的代际关系。

本文的不足在于，首先，研究仅采用了青年样本和横截面数据，但代际沟通涉及两代人且是一个交互式的沟通过程。其次，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结论的可扩展性和可重复性有待继续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通过随机抽样获取二元数据或家庭样本来研究本议题。最后，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家庭因素、沟通因素和情绪因素对“Z 世代”在线代际沟通回避行为的影响，但对部分关键现象的阐释可能存在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质性访谈，使研究结论进一步理论化。

［参　考　文　献］

［1］ Zhou B H，Gui S H. WeChat and distant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a study of online content sharing on WeChat［M］//Xue K，Yu M. New media and Chinese society. Singapore：Springer Singapore，2017：185－206.

［2］ Lopez A G，Cuarteros K G.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J］. Canadian Journal of Family and Youth，2020（1）：66－80.

［3］ 李红艳. 主导者、回应者和游离者：移动传播时代家族微信群的信息传播研究［J］. 新闻与写作，2023(8)：5－14.

［4］ 沈杰. Z 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J］. 中国青年研究，2022(8)：5－13.

［5］ 方楠. 数字代沟中的文化反哺：家庭微信场域代际互动问题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0－17.

［6］ Law J，Young T J，Almeida J，et al. Intergeneratinoal communic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mapping review of research between 1996 and 2017［J］.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2019(3)：287－310.

［7］ Hummert M L.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M］//Donsbach W.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15：273－275.

［8］ Afifi W A，Afifi T D. Avoidance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versations about their parents' relationship：applying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2009(4)：488－511.

［9］ Guerreo L K，Afifi W A. 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unsaid：topic avoidance in family relationships［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5(3)：276－296.

［10］ Caughlin J P，Golish T D. An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opic avoidance and dissatisfaction：comparing perceptual and interpersonal explanation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02(4)：275－296.

［11］ 姚晓鸥，申焙丰. 家庭沟通媒介化中的脱嵌与游离：基于家庭代际间某疫苗信息微信平台沟通的考察［J］. 新闻春秋，2024(1)：76－85.

［12］ 段秋婷，张大伟，谢兴政，等. 沉默的“对抗”：数字原住民信息回避行为研究：以父辈向子辈转发的网络信息为考察对象［J］. 图书馆论坛，2023(2)：26－38.

［13］ 姜婷婷，权明喆，魏子瑶. 信息规避研究：边界、脉络与动向［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99-114.
[14] Dai B,Ali A,Wang H W. Exploring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tention of social media users:a cognition-affect-conation perspective[J]. Internet Research,2020(5):1455-1478.
[15] Afifi T D,Joseph A,Aldeis D. Why can't we just talk about it: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conversations about sex[J].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2008(6):689-721.
[16] Aloia L,Warren R. Cognitive beliefs about,affective reactions to,and behavioral preferences for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21(2):113-132.
[17] 阎云翔,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2017(7):4-15+1.
[18] 陈明红,吴颖儿,李晶,等. 信息回避行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J]. 情报资料工作,2021(3):82-93.
[19] Schrodt P,Witt P L,Messersmith A 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behavioral,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08(3):248-269.
[20] Ritchie L D,Fitzpatrick M A.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measuring intrapersonal percep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0(4):523-544.
[21] Koerner A F,Fitzpatrick M A. Understanding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family functioning:the roles of conversation orientation and conformity orientation[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2(1):36-65.
[22] Koerner A F,Fitzpatrick M A. 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2002(1):70-91.
[23] Zhang Q.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conflict styles in Chines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7(1):113-128.
[24] Scruggs X,Schrodt P. The frequency and comfort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parents as mediator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al quality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2021(1):17-33.
[25] Canary D J,Spitzberg B H.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perceptions of conflict strategie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93-118.
[26] Holman A,Kellas J K.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 parent-child sex talk:how communication, relational and family factors relate to sexual health[J].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2015(5):388-403.
[27] Feldman S S,Rosenthal D A.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family members' perceptions of parents as sex educators[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2000(2):119-150.
[28] Petronio S. Boundaries of privacy:dialectics of disclosure[M].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29] Hawk S T,Keijsers L,Hale W W,et al. Mind your own business!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privacy invasion and adolescent-parent conflict[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2009(4):511-520.
[30] 曾秀芹,吴海谧,蒋莉. 成人初显期人群的数字媒介家庭沟通与隐私管理:一个扎根理论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8(9):64-84.
[31] Tang J,Gibson S J. A psychophys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anxiety, pain perception, and induced state anxiety[J]. The Journal of Pain,2005(9):612-619.
[32] Nozadi S,Tavakoli A R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elf-efficacy in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anxiety[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2015(4):21-25.
[33] Lindahl K M,Bregman H R,Malik N M. Family boundary structures and child adjustment: the indirect role of emotional reactivity[J].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2(6): 839-847.
[34] Sweeny K,Melnyk D,Miller W,et al. Information avoidance:who,what,when,and why[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0(4):340-353.
[35] 张星,王楠,肖泉. 医疗众筹项目的社会规范对个体信息回避意愿的影响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23(3):61-70.
[36] 杨选辉,严章宽. CAC 范式下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算法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情报,2024(2):130-141.
[37] Marteau T M, Bekker H. The development of a six-item short-form of the state scale of the Spielberger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J].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1992(3):301-306.
[38] 王曦影. Z 世代的成长与发展[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1):74.
[39] 李春玲.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J]. 社会学研究,2019(3):1-24+242.
[40] Schrodt P,Phillips K E. Self-disclosure and relational uncertainty as mediator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in sibling relationships[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16(4):486-504.
[41] Hesse C,Rauscher E A,Goodman R B,et al. Reconceptualizing the role of conformity behaviors in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eory[J].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2017(4):319-337.
[42] Koerner A F,Cvancara K E. The influence of conformity orientation o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family conversations[J].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2002(3):133-152.
[43] 周晓虹. 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63-70.
[44] Liu Y,Yang Y W. New "useless education theory":highly educated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evidence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22,72:101764.